

□ 李田清

天锅脚下的兄弟

天锅是什么？如今的孩子恐怕连听都没听过。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黔桂山区，那口扣在屋顶上的“大锅盖”，就是山里人望向外界的眼睛。铝制的锅面亮得能照见人影，稳稳架在钢筋焊成的支架上，对着卫星的方向，把电视信号送进千家万户。

1987年，我来到从江。这里被唤作“省尾”，镶嵌在黔桂边界的群山深处，满眼的贫瘠与闭塞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当地流传一段民谣：“从江也算县，衙门像猪圈，街头打板子，街尾听得见。”即便解放快四十年了，交通仍是山里人的痛处。去一趟州府凯里，要翻雷公山，绕盘山路，250公里的路，汽车要颠簸整整12个小时。

后来我才了解，从江身上扛着贵州三个“最后一个”：最后一个通车的县城，最后一个结束国道摆渡的县，最后一个实现乡乡通公路的县。

而我来的时候，这些“最后一个”还没画上完满的句号，小城依旧在群山里静静守着时光。我进了从江县广播电视局工作，在当年，这可是个让人眼红的单位。那会儿没有网络，没有手机，连固定电话都稀罕，广播电视就是山里人的眼睛和耳朵，也是连接山外世界的唯一窗口。

那时候，单位里聚着一群20出头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。石勇、邹学庆、李云平、江美文、廖育东……名字一个个叫出来，仿佛还能看见他们年轻的模样：有扛着摄像机跑新闻的，有坐在播音室里调话筒的，有背着工具包爬电杆的，还有拿着烙铁修机器的……其中，石勇、李云平、郭春阳、杨承，都是广电职工的孩子，算是“广电世家”的后辈。

广电大楼在老街的航运码头边上，紧挨着粮店，六层楼的房子，在当时的从江算得上“气派”。办公楼和宿舍楼连在一起，我们常说的那口天锅，就立在六楼的楼顶，风吹过的时候，金属支架会发出“呜呜”的轻响。

那会儿还没房改，职工住房全靠单位分，论资排辈，新来的年轻人根本轮不上。我和石勇刚结婚，邹学庆、郭春阳、郭春阳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连个安稳住处都没有，愁啊！局长郭正民看在眼里，跟副局长李自恒、贺国胜商量了好几回，最后拍板：“在六楼楼顶加一层！”

新加的这一层，出来就是天锅。每天下班，不用招呼，我和石勇、邹学庆、郭春阳就会搬着小板凳坐在天锅脚下，李云平、潘海源、江美文、廖育东、杨承也会过来凑热闹。没有桌子，就用报纸铺在地上，摆上从街上卤菜摊买的猪头肉、花生米。酒是本地酿的米酒，用土碗倒着喝，一碗下去，浑身都热乎。

我们就坐在天锅脚下，听着楼顶的风，看着远处的山，喝酒、聊天、谈人生。年轻人心情高，聊起未来，个个都有说不完的话；石勇说要吧技术练得更精，以后全县的天锅都让他来装；李云平说要跑遍从江的每个村寨，让山里人都能看上电视；邹学庆说想当个好记者，把从江的故事讲给外面听；江美文笑着说，先把日子过安稳了，再想别的。

喝到兴头上，有人划拳，“哥俩好啊”“五魁首啊”，声音大得能盖过天锅的杂音；有人喝醉了，就靠在天锅支架上，嘴里骂骂咧咧，说哪个村寨的线路又坏了，明天要早起去修，骂完了又嘿嘿笑；还有人聊起家里的事，说媳妇又催着攒钱买摩托车，说想给父母寄点钱，说着说着，声音就低了下去，可眼里依旧亮着光。

大块吃肉，大口喝酒，没有钩心斗角，没有尔虞我诈，只有年轻人的真诚和热乎气。那些日子，现在想起来，都觉得暖得发烫，所以我们总说，我们是“天锅脚下的兄弟”。

石勇的小名叫石玉宝，个子不高，身材单瘦。他父亲石树明是广电局的老技术工。石勇没进单位前，性子野，是个出了名的刺头。后来他像变了个人，跟着父亲学技术，钻得比谁都认真，修理、装机、安天锅，样样都精通，最后凭着手艺进了广电局技术部。我们总跟他开玩笑：“石玉宝，你这是从‘刺头’变成‘能手’了！”他嘿嘿笑，不反驳，可要是机器坏了，他准是第一个冲上去，爬电杆、拉电线，再危险的活路都敢上。

石勇人长得一般，可娶了个好媳妇，漂亮、能干，在北上新区开了家“老凯里酸汤牛肉饭店”。店不大，就几张桌子，可石勇媳妇做的酸汤是真地道——用番茄、辣椒、姜蒜发酵，酸得纯正，加上本地的黄牛肉，鲜嫩可口。我们常去店里蹭饭，每次去，石勇媳妇都笑着添菜、加汤，从不嫌我们烦。后来，酸汤店的生意越来越火，成了从江的老字号，开了二十多年，现在依旧门庭若市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只是他的脾气还是没改多少，时不时就会骂娘，跟人急眼，可心是热的，谁有难处，他准会伸手帮一把。

李云平是副局长李自恒的儿子，高个子，年轻时长得还算帅气，脾气也好得没话说。你要是急了骂他两句，他也不恼，依旧笑眯眯地看着你，说：“别急，慢慢来。”他也是搞技术的，爬电杆、拉电线、装设备，样样都能干，最常做的就是跑“村村通”工程。从江的村寨散在山里，有的地方车开不进去，只能靠走，李云平背着工具包，一走就是大半天。住在村里的时候，日子寂寞，他就跟着寨子里的年轻人去“唠姑娘”——晚上聚在姑娘家的火塘边，唱歌、聊天，买只鸭子炖了，煮一锅稀饭当宵夜。他长得好，嘴又甜，会哄姑娘开心，寨子里的姑娘都喜欢跟他说话。后来他离婚了，心里难受了好一阵子，我们在天锅脚下陪他喝了好几回酒，他没多说什么，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又乐呵呵地跟我们说，找了个新媳妇，还是个没结过婚的大姑娘。我们都替他高兴，起哄让他请客，他笑着答应，第二天就买来酒菜，我们在天锅脚下喝了个酩酊大醉。

日子就这么热热闹闹地过着，天锅脚下的笑声，伴着米酒的香气，飘在从江的夜空里。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后来，我调离了广电局，去了宣传部，再后来又到了县委办。房改开始了，我分到了新房，搬离了那栋六层楼的广电大楼，离开了天锅脚下的阁楼。虽然还在从江，可工作忙了，和兄弟们聚会的次数渐渐少了，只能偶尔在街头碰到，打个招呼，聊几句近况，然后又各自匆匆忙忙地赶路。

再后来，我下到乡镇当党委书记，更是忙得脚不沾地，和弟兄们的联系越来越淡。有时候想打电话，拿起话筒又放下，觉得没什么急事，等有空了再说，可这“有空”，却迟迟没有到来。2014年，我调去了州府凯里，到了黔东南日报社，离从江远了，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。每次回来，都会去石勇的“酸汤老店”吃顿饭，石勇还是老样子，笑着骂我“没良心”，却依旧给我端上最地道的酸汤牛肉，倒上满满的米酒。我们聊着各自的生活，聊着当年在天锅脚下的日子，可身边的人却越来越少——邹学庆去了乡镇工作，杨丽调到了外县，廖育东、匡益国、黄伟英、欧萍……也先后调离了广电系统，渐渐就断了联系。

前些年回从江，我问石勇：“郭春阳现在在哪里？好久没见了。”石勇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：“不知道啊，听说郭春阳去了贵阳，联系方式早就换了。”我心里一阵空落落的，又问起潘海源、陈时军，石勇的声音低了下去：“前几年就走了，潘海源是生病，陈时军是出了意外……”一句话，像块石头砸在我心上，沉甸甸的。我端起碗，喝了一口米酒，酸得发涩，再也没有当年的滋味。

去年秋天，我又回了一趟从江，特意去了老街的广电大楼——现在的网络公司。楼还是那栋楼，只是显得旧了，墙皮掉了不少。我顺着楼梯爬到六楼，楼顶的天锅还在，只是蒙了一层厚厚的灰，支架锈迹斑斑，再也没有当年亮闪闪的模样。风依旧吹过，金属架发出的“呜呜”声，却像是在叹气。我坐在天锅脚下，仿佛还能看见兄弟们年轻的身影：石勇蹲在地上修机器，李云平扛着工具包走来，还有邹学庆、郭春阳、江美文、廖育东，大家围着报纸铺成的“桌子”，笑着、闹着、喝着酒……可风一吹，影子就散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和一口沉默的天锅。

时光带走了年轻的模样，带走了热热闹闹的日子，却带不走那些刻在心里的记忆。天锅依旧立在楼顶，像一个沉默的老人，守着那些年的故事，守着我们这群兄弟的情谊。以后再想起你们，我还是会像当年一样，端起一碗米酒，敬天锅，敬岁月，敬我们那些热热闹闹、闪闪发光的青春。

□ 顾秀梅

我的母亲是第一届州人大代表



说来惭愧，母亲在世时，我从未留意她是第一届州人大代表的身份，也不知道这个身份背后，藏着她多少不为人知的奔波与辛苦。今年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七十周年，回望一路走来的风雨岁月，我才突然顿悟。

第一次走进黔东南州档案馆，在泛黄的卷宗里，我找到一张珍贵的老照片——黔东南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体代表及来宾合影。照片里三百余人分列四排，最后一排，右起第三十八位，是我的母亲。我仔仔细细找了两遍，才找到她的身影。母亲身形瘦小，身着打籽绣与堆绣相间的凯棠苗族服饰，佩戴银项圈与弓形锁链，头包蓝靛土布帕，在人群中普普通通。照片中，身着苗族、侗族等各民族盛装的代表意气轩昂，并肩而立，母亲和他们一起，代表全州各族人民，在这片民族区域自治的土地上，第一次庄严行使民当家作主的权利。

母亲名叫张玉芝，苗名务兴格，1927年12月出生于今凯里市凯棠镇大坪村。她出身贫寒，五岁丧父，九岁失母，幼年寄养在叔伯家，生活孤苦。十八岁嫁给我的父亲，那时父亲在乡里任教。此后，她便跟着父亲学习认字，学说汉语。清匪反霸结束后，在父亲的支持鼓励下，母亲积极投身农村土地改革运动。她勤劳朴实，处

事认真，为人善良，深得乡亲信赖，加上能识字，会说汉语，被推选为村妇代会主任。依照上世纪五十年代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制度，经逐级酝酿提名，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依法选举，母亲先后当选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第一届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

1956年4月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。同年7月，黔东南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镇远召开，会议审议通过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》，确定州人代会每年举行两次会议。当时的凯棠乡还没通公路，每次开会，母亲总要带上简单的饭团，天不亮就动身。从凯棠村出发，沿古驿道步行，经合江台拱到施洞渡口，乘木船过清水江到施秉马号，再沿山路走到镇远，全程约75公里。沿途山高路险、坡陡谷深，白天翻山越岭赶路，夜晚借宿沿途村寨落脚歇息。一路长途跋涉，脚底经常磨出血泡。一次途中，母亲牙龈发炎严重，肿痛难忍，幸得一同参会的本家堂叔帮忙在山上找来草药，让她嚼烂含在嘴里缓解疼痛，才得以坚持赶路赴会。

“1956年，自治州成立，凯里最合格，工业最发达……”这是母亲常唱的歌谣。自治州成立之初，凯里只是一个小镇，仅有六百多户人家。“最合格”三个字，是母亲那一代人对州府凯里的认可与期盼，更



清水江 刊头图 王晓梅 摄

□ 李伟明

奢侈之别

五代十国之时，历经数十年动乱之后，天下还是让宋太祖赵匡胤得去了。宋太祖的成功并非侥幸。他的所作所为，足以使其在中国历史上众多帝王当中获得高分。不说别的，单从生活作风上来看，宋太祖的见识与修养便大大高出一般的帝王。

《续资治通鉴》第四卷在记录宋太祖乾德四年（公元966年）的大事时，提到这么一件事：后蜀末代皇帝孟昶生活奢侈，就连尿壶都装饰了七宝。宋太祖看到，下令打碎它（后蜀已于前一年亡国，孟昶也在投降不久后去世）。书中还说，宋太祖平时穿戴朴素，经常穿洗了多次的衣服，坐的车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也很简单，内宫的窗帘布帐都是青黑颜色，没有什么花纹彩绘。开封府尹刘光义在宫中陪餐时，说起宋太祖的衣着用品太寒酸了。宋太祖严肃地对他说：“你不记得居住在夹马营的时候了？”

夹马营是宋太祖的出生地，在洛阳。宋太祖说这话的意思，当然是表示不能忘本，切忌一阔就变脸，大手大脚乱花钱。赵匡胤其实也是干部家庭出身，

是老一辈建设自治州的信心与力量。

母亲担任人大代表时，我还没有出生，只能在亲历旧事的亲友口中追忆当年的那份艰辛和荣誉。如今，我有幸成为一名政协委员，却无从知晓母亲当年参与过哪些议案，参加过哪些调研，但乡亲们记得她，村里人遇到难处，第一个找的便是“张代表”。母亲虽文化不高，却公道热心，敢为基层群众发声，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记在心里，带到会上。我虽无从考究她当年的建言，却亲眼见证家乡的变迁：乡路通了，学校建了，村卫生所修起来了……这些变化背后，站着无数位像母亲一样平凡而普通的基层人大代表。

我的母亲是一位远近闻名的苗族歌师。母亲自幼天资聪慧，勤学善悟。十三岁拜师学歌，十六岁熟唱《开天辟地》《洪水滔天》《跋山涉水》等经典苗族古歌，十八岁精通《仰阿莎》等苗族民间叙事长诗，中年已是凯棠一带远近闻名的苗族歌师。母亲说，学古歌就是学做人，明事理，知敬畏，修德行。清晰记得，每到冬日农闲夜晚，我家小木房的火塘里常燃着一堆老树根柴火，暖意融融的火塘边，坐满学古歌的乡邻。教古歌的时候，母亲总会先逐句念诵古歌歌词，遇上寓意深远的词句，便耐心细致讲解，让大家听得懂、记得牢。待大家熟记歌词后，再带领大家轻声哼唱。在那个生活清贫的年代，母亲以古歌为精神食粮，滋养一方乡邻淳朴的心灵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她以歌育人，用心传授，倾尽毕生心血，将被誉为苗族文化“活字典”“百科全书”的苗族古歌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乡邻与后辈。

改革开放后，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。凯里市文化、民宗等相关部门、黔东南州文化馆等相关单位多次到凯棠采集母亲的歌。中央民族大学张永祥教授更是专程从北京回到家乡，系统收录整理母亲的古歌、童谣、民间故事，耗时一个多月。

母亲是凯里市较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她传唱的是我们这代人渐渐生疏的苗族古歌，是几近失传的苗族童谣，是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。她唱了一辈子，传了一辈子。她以平凡之力，默默守护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根脉。

我的母亲是一位乡村教育的倡导者。“念书，是山里孩子的出路。”这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这句话既是她奔走乡间，用心呼吁的心声，也是她盼望子孙后代读书成才，走出大山的信念。过去的农村生活条件艰苦，封建落后思想根深蒂固，乡里多数人家不愿意送孩子上学读书。母亲带头重教，劝导乡邻破除陈旧观念，倡导大家重视教育，崇尚文化知识。母亲将履职中吃过的苦、见过的世面、留下的遗憾、受过封建思想的伤害，都化作了重视教育的坚定执念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我到了入学年龄。那时农村物质生活依旧匮乏，重男轻女思想

□ 尤然

满江红·归隐田园

归隐田园，安居处、农家小院。寂寞时，三五棋友，将帅和谈。晨练暮读寻雅趣，春耕秋收度余年。慢喝茶，喜看梁上燕，衔泥久。

募集珍珠的士兵二千人，称为“媚川都”。这些人的职责就是下海为刘鋹采集珍珠。这项工作可不好干，很多人因此被淹死。刘鋹居住的房屋，都用玳瑁、珍珠、翡翠装饰，奢华至极。宋太祖把南汉灭了之后，便下令撤销媚川都，也就没了这等劳民伤财之事。

我们欣慰地看到，俭与奢的较量，再次以奢侈彻底失败告终。

宋太祖尚俭，不是作秀，不是一时性起，也不是权宜之计。对他来说，这是一种源于内心的自觉，“装”是装不到这么像的，也装不了那么久。《续资治通鉴》第七卷记载，宋太祖的女儿永庆公主曾经穿着一件翠羽绣花外衣入宫。宋太祖让公主把这件衣服给他，还告诉她以后不要穿这种衣服。宋太祖的理由是，公主穿这样的衣服，会让大家效仿，从而抬高翠鸟羽毛价格。作为皇室人家，不能开这样的坏头。还有这一次，公主和皇后一起回宋太祖，做了这么久的皇帝了，就不能用黄金装饰一下专车（轿舆）？宋太祖回答，就算用金银装饰整个宫殿，当然也不是问题；但百姓的钱财怎么可以这样用呢？——这境界，这觉悟，放在今天来说也不落伍吧？

有条件奢侈而不奢侈，这是真正的不想“奢”。这也是价值观的问题。一个人认同什么价值观，就会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，别人是勉强不来的。推崇低调朴实风格的人，行动上便以低调朴实为美。这种人，外表可能平平无奇，内心却

依然严重。母亲与父亲商量后，咬牙下定决心，送我进校读书。她为我树立目标，指引方向，对我严格管教。我一路走来的所有成长与际遇，都是母亲默默替我扛起生活的风雨，倾尽所有为我铺就求学的道路。记忆中，她常把我的小书桌摆放在织布机旁。她一边织布，一边看我做功课，梭子穿梭的节奏声和我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。她不时侧过头来看我的作业本，笑着夸我“有进步”。那台织布机织出了我们一家人的衣裳，也织出了我对未来的向往。学习之余，她教我唱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《社会主义好》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等红歌。母亲识字不多，却把最朴素的信仰，像种子一样，轻轻种进了我的心田。

母亲将对教育的信念，对后代的期望，悄悄藏进了孙辈的乳名里：海军、凯城、筑城、能武、强武……一个个名字，都寄托着母亲的殷切厚望——到部队去，到凯里去，到省城去，要能文能武，要自强不息。如今，母亲的孩子、家孙、外孙、重孙共四十余人，大多走出了大山。他们耕耘在讲台上，忙碌在机关里，奉献在国防上，奔波在工地间，拼搏在车间里……在时代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。

母亲履职期间，为乡亲们谋的是眼前的日子、田里的收成、村里的卫生所、乡里的学校；卸任后，她着眼长远，重视家风家教，用心为后辈谋划未来。她一生未曾讲过深奥的大道理，却用朴素的言行告诉我们：教育，是一个人的、一个家庭、一个民族最大的希望。

母亲当代表时，乡亲们信赖她；她当歌师时，乡亲们敬重她；

她心系后生读书，乡亲们感念她；她为人母亲一生，乡亲们以她为灯。

母亲给予我的，远不止生命。她将乐观向上、坚韧不拔的精神，与人为善、勤劳俭朴的品性，潜移默化传给了我，深深烙进我的骨血。一路走来，每逢风雨坎坷，我总会想起母亲。想起那个天色未明便起身赶路，脚底磨破也步履不停的女子；想起那个饱经世事磨难，仍以宽厚之心待人，以平和之态处世的长辈。

母亲已去世十四年。今年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七十周年。七十载风雨兼程，七十载砥砺前行。自治州的辉煌成就，从来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一代代黔东南人脚踏实地、接续奋斗出来的。回望过往，母亲那一代人，是从旧社会走进新社会的亲历者与建设者。他们经历过社会的苦难，投身新社会的建设，参与了自治州的创建，用心守护民族文化，抚育培养后辈儿女，将生生不息的希望，深深播撒在这片土地上。他们平凡普通，却绝不渺小。

在档案馆，我还翻到了那两届州人代会的代表名册。母亲的名字，静静地印在“炉山县代表团”页面上，手写楷书，刻蜡纸油印，小四号大小，和其他代表的名字并列在册。

翻阅卷宗，重温历史，才读懂母亲的过往与辛劳，也真切体会到第一届州人大代表这一身份背后沉甸甸的责任与分量。那一刻恍然发觉，母亲从未走远，她的名字留存在档案馆的卷宗里，与第一届、第二届州人大代表的名册同在，深深镌刻在黔东南的发展史册里。

我的母亲，只是这片土地上最平凡的一个。而正是千千万万个平凡的普通人，共同书写了黔东南七十年的壮阔篇章。

家酿淳，呼朋饮。得佳句，炫文苑。有肥田二亩，岁岁丰宴。功名利禄身外事，街坊邻里心相连。闲时月、纵情山水中，神仙美。

自带清新鲜脱的气质。而喜欢显摆、羡慕虚荣的人，哪怕人不敷出，宁愿做“老赖”也要“好日子先过”，不择手段坑蒙拐骗花别人的钱尽自己的兴。这种人，骨子里满是腐朽气息，就算到了穷途末路，恐怕也不肯悔改。转化他们，比登天还难。

孔子说：“奢则不孙，俭则固。与其不孙也，宁固。”意思是说，奢华会使人傲慢，俭朴则让人寒酸。但宁愿寒酸，不要傲慢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傲慢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，让人走向狂妄，无所敬畏，导致败家。它的后果，当然比寒酸不自信要大得多。至于讲究物质享受的人，心灵高尚不到哪里去，所谓的“好日子”也难以长久。这种人如果掌握公权力，地位越高，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越大。

尚俭还是尚奢，并非一成不变。一个人一旦崇尚奢靡生活，他的追求便不同了，行为也变了，人生下坡路也就开始了。孟昶便是这样，当上皇帝后，前后宛如两人。其他如晋武帝、唐玄宗、宋徽宗等人，也有类似之处。在那些“大人物”当中，这种“大反转”的剧情太常见了。

李商隐的《咏史》诗说得真好：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败由奢。”奢败俭胜，历来如此，并非偶然。时间不会撒谎，历史不会误人。今人读史，当时刻记得这些古训，有所感悟，有所警醒，自觉远离奢靡之风，哪怕物质条件大有改善，也不忘以勤俭为本。